

宋代书院的兴起及其意义

赵 旗

(西安邮电学院 社科部,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书院兴起于宋代并获得巨大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一方面,虽然通过三次兴学运动,官学有所发展,但其一直不能完全适应教育和学术全面发展的形势,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学校形式出现。同时,政府的大力支持、学术的繁荣和印刷术的进步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因此,书院便在宋代应运而生了。书院的兴起,对当时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曾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后世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宋代书院; 官学; 文化背景; 意义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2X(2002)02-0064-05

一、宋代官学的发展

宋代初年,由于五代战乱的影响,地方官学几乎空缺,中央官学的状况也极不景气。由于官学不能适应社会对人才的急需,所以政府就越过官学,在全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即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此年取进士十九人。此后,科举取士人数越来越多。科举对人才的急需与官学的不景气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从而使官学和科举制度脱节,造成了人才培养与选拔方面的种种弊端。为此,在政府的提倡与支持下,曾先后发起了三次兴学运动。

第一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史称“庆历兴学”。在这次兴学运动中,地方官学大量建立,作为中央官学的太学也建立起来,这就为政府的科举取士提供了保障。在此基础上,政府又采取了措施,以改变教育

和科举的脱节状况。据《宋史·选举志》记载,以往科举“试已,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学校)但为游离之所,殊无肆习之法,居常听者一二十人尔”。兴学运动中,采取的具体措施就是限制士子的在学时限,规定只有在校学习达到一定时限者才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具体规定为:“限在学满五百日,旧已尝充贡者止百日,本授官会其实,京朝官保任,始预秋试”(《宋史·选举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学与科举脱节的矛盾。

庆历兴学对官学与科举脱节矛盾的缓解是有限的。官学的大量兴建固然为科举取士提供了保障,但是官学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并未接轨。首先,教师的任用带有很大的任意性,教师没有统一的资格考试。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在教师的任用上,由“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可见,教师的任免权在地方官员手中,这就使官学教育在方法上因教师不同而各异。其次,官学教育内容未能严格统一,实际上由

收稿日期: 2002-03-07

作者简介: 赵 旗 (1967-),男,陕西千阳人,西安邮电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教师的学术兴趣而定,这就使得以科举出身为求学目的的学生并不能把官学作为必然的选择。第三,也正是由于前两方面的原因,学校实际上成了科举考试的短期补习班。为克服这种状况所采取的在学时限制规定只是一种形式性的规定,未能解决官学教育内容和科举脱节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并且,就是这种形式上的规定,后来也因“谏官余靖极言非便,遂罢听读日限。”(同上)此次兴学运动的不彻底性,是引起第二次兴学运动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公元1068~1085年),由于是王安石发起的,所以也称“荆公新学”。这次兴学运动是以太学为中心进行的,具体措施是在太学中实行三舍法。三舍法是一种考试升级制度,学生入学时要出示所属州开据的证明,并通过考试进入太学外舍学习。此后,通过考试逐步升入内舍、上舍。外舍成绩优异者升入内舍学习,“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等俱优者为上舍上等,取旨命官。一优一平为中,以俟殿试。一优一否或俱平为下,以俟省试。”(《宋史·职官志·元丰官制》)可见,太学虽名为三舍,其实只有外舍和内舍两个学习阶段。上舍学生或可直接授官,或可免省试,或可免发解试,实际上已无须在太学学习了。太学三舍法的实施,使太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真正接轨,太学所学的内容,也就是科举所考的内容,太学毕业之日,就是科举入选之时。这就使一部分学子可不必通过科举一次考试定终身,而可逐步学习、考试,最后达到入仕的目的。

“荆公新学”完善了太学的教学、管理制度,把教师选用、教材确定、考试升级等环节都纳入了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由此,宋代的官学教育制度基本确立。

第三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在这次兴学运动中,曾下诏天下置学,推行三舍法。学生由县学经过考试升州学,再由州学升太学,太学上舍可按等次直接授官、免省试或免发解试。又下诏州县置小学,在小学中也实行三舍法,小学生通过考试可升县、州直至太学。这样一来,由小学到太学,由地方官学到中央官学,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制。

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推动了官学的发展,较好地解决了官学和科举相互协调的问题,但并未克服官学自身所存在的缺陷,只是随着兴学运动的发展,官学的缺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庆

历兴学前,官学的主要缺陷是数量太少,无法满足士子求学的愿望。在庆历兴学期间,学校大量兴建,但和科举脱节,学校教育未能置于政府统一控制之下。熙宁兴学以后,学校教育和科举脱节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由于政府对学校教育控制过严,使官学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单一,使不同学术流派难以立足官学。

官学自身是在不断发展中,但官学总是难以适应教育和学术全面发展的形势,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学校形式出现。于是,书院便在宋代应运而生。

二、宋代书院的文化背景

宋代官学不能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固然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我们的研究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只能得出一个书院是在夹缝中生存的印象。而从现有资料显示,书院不仅填补了官学的空白,与官学同步发展,而且存在着越来越盛于官学的趋势,这就需要解剖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宋代政府的支持是书院发展的保证。宋初,因“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衡州石鼓书院记》)。其扶持的主要方式为赐书、赐田和赐额。从庆历兴学开始,政府将注意力转向官学教育,兴建了各级官学,对书院的扶持相对较少,但从未禁绝过书院的发展,并且对书院教育始终给予一定程度的自由,南宋在禁朱熹“伪学”期间,朱熹和其弟子仍得以在书院传播其学就是明证。政府对书院扶持最得力的时期,也正是书院最为兴盛的时期。可见,政府的支持是书院发展的保证。

其次,宋代学术的繁荣是书院发展的基础。宋代由于三教并重的文教政策,儒、佛、道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理学是哲学化的儒学”^[1](p. 364)],主要讨论的是“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性”指人性,天道即“天理”或简称之为“理”。理学家在探讨“性与天道”的问题时,还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范畴和命题,达到了理论思维史上的新水平。

理学创始于周敦颐,至北宋熙宁间程颐完成其主要著作《伊川易传》,已形成了理学的完整体系。

到南宋朱熹作《四书集注》，标志着理学已达到了成熟阶段。在这一时期，理学家人才辈出，除朱熹外，理学家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他们的学说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儒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佛教由于宋初几位皇帝的支持，很快就出现了繁荣景象。天禧末（公元1021年），全国僧尼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也相应增加，有近四万所。朱熹在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所写《申修白鹿书院状》中称：“庐山山水之盛甲于东南，老佛之居以百拾数，中间虽有废坏，今日鲜不修葺”（明天启间修《白鹿书院志》卷三）可见，直至南宋，佛教寺院还能保持其盛况。宋代最流行的佛教宗派为禅宗。禅宗各家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有一定的成就，并且和当时的思想界接触频繁，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道教理论在宋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卿希泰先生认为，宋代“道教的教义理论更加丰富和发展，并由重视外丹转向侧重于内丹之研究，继续处于兴盛和发展的时期。”^{[2](p.131)}道教理论的发展对儒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儒、佛、道三教的繁荣过程，伴随着三教间的相互辩论和交流活动，这就需要一定的场所，书院正是这样的学术交流中心。据《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的记载，“傅寅……于经史百家，悉能成诵，比长，益求异书读之”，“异书”不仅指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学校、律历类书籍，也包括佛、道典籍。对于这样一位于儒、佛、道无所不学的学者，吕祖俭（祖谦弟）“尝延之丽泽书院中，列坐诸生”（《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使其讲授所学。可见，书院是儒、佛、道三教交融的重要场所。三教共同的繁荣，显然扩大了书院的教育内容。

另外，佛、道二教的某些制度对书院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隋唐至北宋，有不少儒家学者寄寓寺观读书。孙复和石介曾至泰山，“寓居山南麓栖真观，苦读十年”^{[3](p.153)}。程颐曾亲临天宁寺观察僧徒生活状况，见其“趋进揖逊之盛，叹曰：三代威仪，尽是在矣！”（《二程全书》卷三十七）对寺院的教育活动给予了肯定。孙复、石介、程颐等人曾长期执教书院，他们的寺、观活动的经历，为书院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实际上，许多书院就是由原来的寺观发展而来

的。如宋初著名的石鼓书院，旧为寻真观，河南嵩阳书院，北魏时为嵩阳寺，隋改为嵩阳观，唐初改称太乙观，后周时在此建太乙书院，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更名为嵩阳书院。此外，象泰山书院、岳麓书院等都属此类书院。

理学的发展是书院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也给书院发展以有益的影响，可见，学术的繁荣是书院发展的基础。

最后，宋代印刷术的进步是书院发展的条件。书院是读书、授书的学术单位；书籍是书院的精神食粮。而书籍的刊行又需要文化传媒技术，特别是印刷术的进步。

在唐代的基础上，宋代的雕版印刷术更加发展，趋于鼎盛，形成了河南、四川、福建和浙江等印刷中心。经、史、子、集著作都有所刊印。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朝廷组织专人在成都版印《大藏经》，共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历时十二年才雕印完工，雕版共十三万块。1132年，在湖州刊刻佛藏五千四百卷，一年之内即告完工，可见技术的进步。

宋代在印刷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是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活字印刷术是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的平民毕升发明的，是现代汉字铅印技术的雏形。在公元1241—1251年间，姚枢教弟子扬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记说》等书。由印刷术进步而引起的书籍的大量刊印和广泛传播，对宋代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宋代书院的意义

由于种种便利条件，书院在宋代应运而生。书院的兴起，在当时曾发挥巨大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书院的兴起和繁荣在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初百废待兴，政府尚无暇顾及教育。直至庆历兴学，中央官学仅一国子监，地方官学尚少。而宋代在开国之初即定立了重文抑武的政策，以科举取士，士人求学日切。在这种情况下，“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全国出现了著名的书院，担负起教育的职能。其中，白鹿洞、华林等著名书院

学生常达数百人,而宋初中央官学国子监在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生徒只有七十人。可见,书院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的主导力量。随着三次兴学运动的开展,官学系统逐渐完备,但书院在担负教育职能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至南宋理宗、度宗时期,书院再次兴盛,在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书院的发展对宋代学术,尤其是对理学的兴起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作为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虽未曾大规模建学授徒,但鉴于他对理学的贡献,人们曾于江西南昌、宁州等地建有宗濂书院、濂溪书院等纪念他。理学至二程开始兴盛,二程大规模设学授徒,弟子众多,其学术被称为洛学。程颢曾建有明道书院,程颐曾建有伊书院以授徒,游酢、谢良佐、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等人就是从学书院的弟子。

南宋最著名的理学家当推朱熹、陆九渊和吕祖谦等人。这三人都以书院为基地传播其学术,把理学推向了高潮。其中,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最重视以书院为基地发展和传播理学。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朱熹知南康军,复兴了废弃已久的白鹿洞书院。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朱熹重修岳麓书院。在重修岳麓书院的同一年,朱熹于福建考亭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仓州。仓州精舍是此后朱学重要的传播基地,从学者众多。《宋元学案》中设有《仓州诸儒学案》记载从学此间的弟子事迹。在学禁最严的时期,朱熹也在此讲学不断。因朱熹长期讲学于此,朱学又被称为闽学或考亭学派。

朱门弟子利用书院传播朱学者很多。朱子大弟子李燾,在学禁最严时任堂长讲学于白鹿洞书院。朱子门人钟震曾讲学于主一书院。朱熹门人辅广则讲学于传贻书院。正是由于朱门弟子及其后学于书院不懈地传播朱学,使朱学不但度过了学禁,而且日益发扬光大,至理宗时终于为朝廷立为儒学正宗。

陆九渊是和朱熹齐名的理学家,也是一位弟子众多的教育家。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陆九渊在家乡建槐堂精舍以授徒,有不少弟子得其真传。淳熙十四年(公元1178年),陆九渊开始讲学于应天山精舍,十五年改名象山精舍。象山精舍食宿条件极为艰苦,连斋舍学粮都要由学生自行解决,但教学双方都能真心为学。据《陆象山全集》卷三十

六《年谱》记载,“先生讲论,终日不倦,夜亦不困。”“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而“诸生皆俯首拱听”。在五年中,传授弟子达千人以上,教育成果极为辉煌。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陆九渊任官荆门,临行还把书院托付给弟子傅子云主持。陆九渊去世后,其弟子在象山精舍处正式建象山书院,在槐堂精舍处也建立书院并立祠堂以纪念。

和朱陆同时负有盛名的理学家还有吕祖谦。吕氏学术主要得自家传,被称为中原文献之学。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吕祖谦执教于丽泽书院,订有规约,编有《丽泽讲义》,从学者众多,丽泽书院因而也被誉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在中原文献之学的传播中,丽泽书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祖望曾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明招学者,自成公(祖谦)下世,忠公(吕祖俭)继之,由是传道不替,其与岳麓之泽并称克世……明招诸生历元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为明开一代学绪”(《宋元学案》卷七十三)把这一评价用之于整个书院教育为传播理学所作的贡献也是恰当的。

第三,宋代书院为后世书院教育提供了样板,也为现代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发展至南宋,书院制度逐渐完备,在教学方面形成了显著的特点。总体上说,宋代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特有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书院是反对科举的。这些特点对元、明、清各代书院发生了重要影响。直至清末书院改学堂,书院一直是官学之外最为重要的教育文化机构,在传播知识和发展学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学校制度普遍推行以后,书院也并未绝迹,抗战时由马一浮创办的复性书院就是一个著名的范例。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形式,书院制度不可能取代现代学校制度。但书院制度所体现出的某些优越性,完全有必要为现代学校制度所借鉴。对此,金景芳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书院带有民办性质,最易接近群众;书院以自学为主,便于因材施教;书院聘请名师任教,可避免照本宣科,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他认为可以成立书院,作为学校制度的补充^{[4](p.388)}。这些意见是中肯的,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张岂之.中国儒学思想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2] 卿希泰 . 中国道教思想史纲 (第二卷)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3] 李国钧 . 中国书院史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4]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 . 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 (第一辑) [C].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责任编辑: 苏晋生)

On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ise of the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in the Song Dynasty

ZHAO Qi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Xi'an Institute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710061 Xi'an,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reats the background, against which the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appeared and achieved a remarkable development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significance, with which the academy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It states tha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drawbacks of the official school system, insufficient for the growing education and learning, gave rise to the founding of the academy, and that,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the flourish of learning and the advance of printing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y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at the academy, in return, satisfied these demands. Moreover, it had a most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e following centuries.

Key words the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official school system; cultural background; significance